

“回首我的人生，以奋斗为开始，以辉煌为展现，以自我毁灭为结局。”在中纪委官网上线不久的栏目“忏悔录”中，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

贪官的忏悔，为看待贪腐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也为当下的反腐败进程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与提醒。

当落马贪官回首人生——

权力任性酿就苦果

本报记者 刘少华



昔日
高位官，今日阶
下囚。在囹圄中将自
己的生命过往一一回顾，白纸
黑字地落笔，再交由中纪委公布
天下。

对于个人来说，这无疑是最可悲可惜
的一种经历。且不说一人落马之后给周遭
之人带来的影响，仅从组织上说，党培养一
个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是花费了大量的时
间精力、人力财力的。习近平曾在一次会议上
说，每次看到落马的高级干部，心里首先是一种
“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如果我们细究贪官的人生经历，也经常可以看到，
这些人可能家里有老母亲，可能出身贫寒，可能吃过许多苦，也可能有着实干和能干的青壮年时代。就像《红与黑》里的于连，因为前后经历的对比以及凄惨的下场，才更突出这种悲剧的“可惜”氛围。

但在感性的“可惜”之后，我们会感到，读这些忏悔录，
会有“可气”的感觉。

之所以这个论断，是因为，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相似的诱惑，
在相似的环境下，大多数人保持住了定力，但有人迷失了自己。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就忏悔自己因为迷上玉石而玩物丧志，
最后栽在“雅贿”里。是玉石的错么？不，是自己的信仰发

贪官忏悔录：

可惜、可气、可警

申孟哲

生了扭曲。

事实上，从2013年起，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开设了“以案警
示”栏目，定期刊登贪官案件的剖析，并有其本人的忏悔内容。这
些官员大多级别不到“老虎”，但是正因为此，才让普通的党员干
部可能有“类似”的感觉——级别相似，遇到的情况也可能相似。

比如，有的曾经是“打黑英雄”，但是却对“家里人”不断
照顾，暗地里输送利益；有的喜欢下班后跟朋友“哥们儿”喝两杯、
打几把牌，最终在赌局中抽不了身；有的是被勾肩搭背的老板们
“围猎”，有的则是被一度的“红颜知己”所“狙击”……

这，也就是贪官忏悔录的警示作用。

我们说，反腐，从来不是一场个人利益之争，也不是为了
整谁；让贪官忏悔，也不是要把谁钉在耻辱柱上，或者五花大
绑游街，而是为了警示全党、净化政治生态。他们经历的，
别人也一样可能经历；他们被一些东西绊倒，有的是个人
原因，有些可能带有普遍意义。

因此，党员干部看了这些忏悔录之后，要能“见
不贤而内自省也”；党内有关部门看到这些忏悔
录，应该对某些有
共性的问题及早
研究，并且做出
相应的制度设计，
以防更多的人再
次摔倒在此处。



三言两语

贪官往往都
有点所谓的“本
事”，或大刀阔斧，马
到成功；或八面玲珑，善
于协调；或见风使舵，头脑
灵活，给人“能吏”的印象。
如果是廉吏加能吏，多几
把刷子，就会对社会作出更
大的贡献，传递更多的正能
量。如果是能吏加贪官，则
所谓的“本事”越大，危害
就越大。《三国演义》里有
个吕布，本事不可谓不大，
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仗义的三
个人“刘关张”合起来都斗
不过一个吕布，这就是“三
英战吕布”的故事。可这吕
布是个“三姓家奴”，先拍
（马）后（出）卖，已背叛
出卖了三个主子，最后被火
眼金睛的曹操识破。曹操
爱才，对关羽、张辽恭敬有
加，却唯独对吕布不“用其
所长”，坚决杀掉，因为凭
着政治家的直觉和经验，今
天不杀吕布，

贪官与能吏

严冰

明天就

要被吕布所杀，董卓等的下场是前车之鉴。

贪官具有两面性，他们对群众和部下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这是他们的本相、真相；对影响升迁的权力人物则阿谀奉承，指鹿为马，端尽谄媚溜须之能事，此时的殷勤周到是他们的假相。需要权力人物的提携时，这些人就成为他们围猎的对象，不需要的时候，就成为他们出卖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贪官相貌很丑，却能屡屡得志。其实，识破贪官并不难，就看他或她对群众的态度。

所以，领导干部选拔使用干部，还是要以德为先，不管能力有大小，关键看他或她是不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友善的人、一个有着美好精神境界的人，千万不要成为贪官围猎的牺牲品。

一条雷同的人生轨迹： 他们许多曾经是能吏

自大，很多人就是在这种心态之下出的问题。“掌权之后经不起诱惑，而且自信度过高”。

因贪污、受贿案被判无期徒刑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政协原主席、党组书记杨跃国就是这样典型的案例，当地干部评价他，“有能力，也有水平，就是权力太集中；想干事，也能干事，就是干事没原则”。他自称，在任瑞丽市委书记期间，“没有我办不了的事情”。

阅读这些落马官员的忏悔书，许多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人生轨迹经历了一条抛物线。

在看了23名贪官的《悔过书》之后，陆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政治委员张学杰总结说，他们的人生轨迹大体相同：都经历过苦难的童年、奋斗的青年、上升的中年，最后都走向悲惨的晚年；他们的血泪教训也几乎相同：那就是丧失了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

比如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在忏悔书中写道，他出身贫农，从大队会计



干起，一直干到副团级，连续参加六届全国党代会，连续四届当选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官员并非一开始就贪污，也是一步步上来的，但是随着手中的权力增大，所受到的约束反而会越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

问题出在哪里？落马官员的悔过书中，自己寻找了一些答案。

思想蜕变是普遍的。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认为，他的问题主要是在人生的晚年放松了学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问题，导致了思想滑坡。“担任副省长后接触的面广了，层次高了，看到的听到的各种社会现象也多了，致使我思想产生了错觉，把社会不正之风非主流现象误认为是社会普遍主流潜规则。”他说。

转变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温水煮青蛙”是常态。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白恩培在悔过书中认为，他的严重违纪违法是

一步一步发展的，从请客送礼、接受礼品馈赠到权钱交易、收受巨额贿赂，数量上由少到多、由小到大，心理上由小心不安到心安理得。

一种不良的政治生态： 个人贪欲带来家族腐败

落马贪官与周遭环境的互动，是忏悔书中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周边环境对官员的“围猎”，还是家庭因素，都成为其落马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原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忏悔，家就是权钱交易所，他本人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不仅全家老小参与腐败，也带坏了干部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坏了政治生态。

在省政分管国土资源工作的倪发科，因为长期收受玉石、玉器受贿赂，如今已在舆论中成为“雅贿”的代名词。他反思说，正是因为自己痴迷到了爱不释手、不能自拔、玩物丧志的境地，老板们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送来的玉石、玉器经鉴定价值1000多万元。倪发科本人，也栽倒在了“疯狂的石头”上。

认为自己对不起家庭，也是落马官员悔过书中体现出的的一项共性。

湖南省公安厅原党组成员、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作为湖南省交通系统系列腐败

一种必须重视的警示： 不让“双面人生”逍遥法外

“公布忏悔录，对于许多官员来说有着警示意义，让他们真正意识到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以及对于社会甚至自身家庭的伤害。”竹立家认为。

不少观察人士都认为，官员的忏悔通过公开平台扩散出来，在腐败预防过程中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认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应该逐渐开始与治本并重。

更进一步的是，这种忏悔录所公布的细节和情节发展的逻辑，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提供了更多的警示。竹立家认为，这些忏悔录提醒我们，我们在对官员的有效监督方面，还有很多漏洞，让他们有越界的可能性。

就连落马官员自己都这么认为。“一个人的权力太大了，独断专横，他就会将权力为自己所用。”辽宁省广播电视台原党组成员、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就是因为把权力当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影视行业内的贪腐“潜规则”，最终在去年被判处无期徒刑。进一步扎紧制度的笼子，对权力进行制约，

早已成为近年来中国反腐败自上而下的共识。3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陈述2015年的主要任务时，提到了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

全面从严治党的极端重要，写下忏悔录中的官员对此深有感触。“血的代价和沉痛的教训让我认识到，党中央对党员领导干部从严要求和严格管理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政治生命终结之后，倪发科如是说。

每当有重要官员落马，人们总会发现，此前他们在一些场合谈反腐问题的慷慨激昂，有些官员如苏荣等，反腐讲话中甚至“狠劲”十足。有网友因此戏称这些人“演技派”——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台上台下风格迥异。

“这是一种彻底的讽刺，能在台上讲出那些话，说明他们知道党和人民对他们的职务期望是什么，结果下来照贪不误。”谢春涛表示，这是一种“双面人生”。

质不好，只知道为老婆孩子谋私利，或者坐视他们打着自己的旗号做事，既没有修身，也没能齐家，你怎么能指望这些人治国平天下？”

心态的失衡，是贪官们提及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引写道，看着老板们住豪宅开好车，穿名牌出入高档会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反观自己，层次比他们高，文化水平也比他们高，没日没夜地加班，每个月就拿这点工资，“觉得太亏了！”

政治生态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在谢春涛看来，十八大以来大批官员的落马可以说明的是，此前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肯定出了问题，对于一些干部来说，坚持原则的成本很高。尤其是一把手贪腐，对于下面人的影响会非常直接。

“但是另一方面，哪怕环境再不好，难道是非黑白的界线还不清楚吗？同样的环境，有人出问题，可有的人不出问题，不能只推卸责任到环境上，而忽略了个人主观意志的巨大作用。”谢春涛认为，“环境当然要改善，但是关键还是靠自己。”



冯伟林自己是这么分析的，“在单位，我对我的下属也有严格的要求，经常在外面演讲写文章，表明自己的道德情操。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贪图享受的欲望。”

有别于在台上时大谈特谈反腐，这些官员在落马后的忏悔，对贪腐问题的认识看上去更为深刻。

“假如‘八项规定’、‘反四风’、‘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重大举措早出台3-5年，我可能也不至于痴迷上疯狂的石头，犯下如此重罪”，倪发科这样觉得。